

尋找歷史的軌跡： 臺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與過渡(1895-1924)*

黃美娥**

摘要

在目前兩岸可見的臺灣文學史著述中，談及新文學的發展，大抵是從二〇年代初期陳炳、陳端明、黃朝琴……等人鼓吹白話文的奠基之功論起，並以一九二四年後所爆發的新舊文學論戰為主要敘述焦點，如此的書寫，暗示了研究者將臺灣新文學的興起視為與傳統文學的決裂與對立，但此等「斷裂關係」的呈現是否為描述臺灣文學由「舊」到「新」發展進程的唯一視角？本文從追求「現代性」的角度出發，發現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四年間臺人在面臨西風東漸的時代新變下，對於新知、新學的強烈渴求所造成的社會內部改革動力的長期需求，可能更是日後具現代特質的「新文學」得以成功醞釀的重要原因；而其中，向居文壇領導地位的傳統文人，在「舊」文學向「新」文學過渡時代所發表的若干文學改良言論，對新文學的發展也做出支援與滋養，發揮了一定程度的催化之功。因此，就此而言，新舊文學間也能存有連續而非斷裂的結構關係。其次，在追求現代文明的論述基礎上，本文更進一步探索臺灣文人既已肆應時局而致力文學改良，本當有利於早早刺激新文學的興起，但卻因日本治臺時再度確立以漢詩為主流的舊文學社會型態，以及其他文化、政治、社會等因素的制約影響，以致強化新舊文學相互對峙的緊張關係，而導致臺灣新文學萌芽的時機遠較日本、中國晚了許久，成為「遲到」的臺灣新文學。

關鍵詞：臺灣、新文學、傳統文學、過渡時代、現代性、對立史觀

* 本文初稿曾於成功大學舉辦之「臺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宣讀（2002年11月22-24日）。

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與建議，謹此致謝。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 二、追求「文明」：新時代下臺灣傳統文人的思維結構
 - 三、革新與啓蒙：舊文學界的改良之路
 - 四、在新與舊之間——過渡時代下的文學創作
 - 五、遲到的臺灣新文學
 - 六、結語
-

一、前言

在目前兩岸可見的臺灣文學史著述中，有關新文學的發展，大抵是從二〇年代初期陳炳、陳端明、黃朝琴……等人鼓吹白話文的奠基之功談起，並以一九二四年後所爆發的新舊文學論戰為主要敘述焦點，如此的書寫，暗示了研究者將臺灣新文學的興起視為與傳統文學的決裂與對立，但此等「斷裂關係」的呈現，是否就是考察臺灣文學由「舊」到「新」發展進程的唯一視角？倘若從文體來看，臺灣舊文學到新文學的出現，究竟是二種文體間的瞬間決裂新變，抑或其間實際也存有銜承過渡的轉化痕跡？另外，若就文體／文學思想與時代性的關係來看，新文學向來被視為是新時代的產物，最能呈顯新思維，但是歐風東漸，現代文明進入臺灣後，當時位居文壇主流的舊文人，對於新知新學的熱烈渴求也不乏多見，殷切期盼維新的時代話語，更多所表露於其言行與創作中；因此從追求「現代性」的角度而言，若干舊文人發諸於外的新思考、新觀念或著述創作中的新題目、新內容，對於日後新文學的誕生，是否也有著推波助瀾的孕育動力？如此一來，對於「新文學」之所以形成與誕生，聚焦於文學史上一連串觀念與想法的光譜上，可能更是獲得較為客觀答案的方向所在。那麼，重新審視一九二四年前臺灣舊文人向新思潮靠攏的文學思維與創作表現，將有其一定的意義；而過去將傳統與現代間的不相容性、新與舊的緊張對立關係，當成是一種研究前提的說法，也就有了重新省思的空間。

而除了上列情形外，吾人尚且注意到，相關研究者在書寫臺灣白話文學的萌生時，雖然曾經留心臺灣島內企圖與外在新世界相連接的革新呼聲，但更多篇幅則著墨於張我軍的貢獻，遂也形塑了臺灣新文學是在受到中國五四白話文運動刺激影響後才真正產生的主要解釋框架。如此的言說雖有其真實性，卻也彷彿將舊文學到新文學的變化階段，凝滯固著在某一靜止的時間點上，以致忽略了在此之前臺灣文壇早已存有的諸多變化歷程。尤其，乙未割臺後的臺灣，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其所能接觸的「新體」文學，隨著當時教育管道、報章雜誌或相關書籍的出刊與傳播，刺激來源應當至少有三：一是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維新後逐漸產生的「近代文學」，在一八八〇年至一八九〇年代所謂「言文一致」運動及文學改良運動已經產生；⁽¹⁾ 二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晚清時期曾經出現的白話文運動與文學改良風潮；其三才是一九一七年的中國白話文運動。那麼，臺灣在面對來自日本近代與晚清、新中國時期的新文體改革運動時，舊文人/舊文學呈顯了何種肆應態度呢？又，何以臺灣要到一九二四年新舊文學論戰後，新文學的「典律」(canon)才普遍獲得較大的認同與實踐呢？仔細深究這段歷來未獲探討與勾勒的新、舊文學「過渡時代」，將是澄清迷津的關鍵所在。

二、追求「文明」：新時代下臺灣傳統文人⁽²⁾的思維結構

一八九五年，對於臺灣文壇而言，是一新變的關鍵時刻，因為「本島自改隸而後，凡欲攻漢學者，於文不受制藝所拘，於詩不為試帖所厄，上下千古，縱意所如，誠文運丕振之秋，詩界革新之會也。」⁽³⁾ 相較清代，乙未割臺雖然導致臺人

(1) 參見葉渭渠、唐月梅，第一章〈近代文學的啟蒙〉，收於氏著，《日本文學史——近代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頁28-56。

(2) 傳統文人，或稱舊文人，在本文中筆者用以指稱其學生文學創作主要表現在傳統文學（文言文、漢詩、文言小說……）寫作上的文人而言。這些人的文學成績，儘管可能不乏維新思想的言論或創作，如連橫、魏清德、張純甫、謝雪漁、鄭坤五、黃臥松……等，但後人仍以其舊文學的成果作為一生評斷所繫，此即筆者所謂的傳統文人群。另外，某些文人雖然一生中曾經寫過傳統文學作品，如張我軍、賴和、林荊南……等，但是由於其人對於新文學（白話文、新詩、白話小說）的強力支持與創作實踐，尤其在新、舊文學論戰中站在支持新文學的一方，對於傳統文學多所批判，那麼筆者在本文中便將之視為新文學家一方。

(3) 參見不著撰人，〈臺灣文社設立之旨趣〉，收於《臺灣文藝叢誌》，第1號（大正8年1月1日）。

無法再登青雲之路，但卻意外開啓文學新機，促使文人勇於擺脫科舉束縛，得以言所欲言，隨心吟詠。而同時期，也因日本帝國殖民進步主義，臺灣漸漸步入文明之域，加上歐風東漸，社會丕變，不管在物質或精神文明上，都有了與前大不相同的面目。對於這個嶄新時代的來臨，臺灣傳統文人是如何面對與看待呢？又，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的發生，歷來被視為新文化運動的一環，新文人／新文學成爲啓發文明思想，百般革新先導的角色，那麼，新時代下的舊文人／舊文學又有何種表現呢？是否誠如一九二四年新舊文學論戰發生後，張我軍等人所砲轟的「守舊」與「落伍」呢？

(一)維新話語——「文明」與「新頭腦」

時代的變動，其實大多數的傳統文人多能感受這股新舊衝撞、交迭的風潮，在時人的言論中，「追求文明」的維新話語幾乎成爲時代主調。

黃植亭〈喜晤謝介石詞客即次其見寄韻〉一詩，以「文明」一詞譽讚謝介石卓越的表現，其云：

踏遍都門風月地，歸來貯滿錦囊詩。而今換得文明腦，氣象翩翩異舊時。⁽⁴⁾

他肯定謝介石由京歸來，必定獲益滿囊，特別是能夠換來「文明」頭腦，氣象一新，大異舊時，更爲眾人所嘆服。再如，洪以南〈無題四首〉之四，也是感於時代「新」局而發：

兵操聲高振國魂，宅近兵營每晨操練之聲徹耳，小園樹鳥促朝暾。悟機換得新頭腦，實學文明望後昆。⁽⁵⁾

詩歌末尾二句強調「悟機」換得「新頭腦」之必要，也寄語後輩能習得實學文明，趕上潮流；而當謝雪漁獲見此詩，還特別指出：「實學文明望後昆一語，先得我心，君與余同庚，而家嗣長庚年已十七，卓犖英偉，現肄業於京都府立中學校，實學文明，誠有然也，豚兒輩正未知能實學文明否也？」⁽⁶⁾以自己兒輩表現不知能

(4) 黃植亭，〈喜晤謝介石詞客即次其見寄韻〉，《臺灣日日新報》，第2287號（明治38年12月15日）。

(5) 洪以南，〈無題四首〉，《臺灣日日新報》，第3095號（明治41年8月23日）。

(6) 以上謝雪漁之漫評，附載於洪以南〈無題四首〉之後，《臺灣日日新報》，第3095號（明治41年8月23日）。

否達到實學文明而憂慮。

此外，「文明」一詞也是時代中人評鑑事物的標準，顏笏山〈敬賀雲年宗兄新築落成即次瑤韻〉可以為證：

欲後光前計已周，更觀輪奐善綢繆。充閭無限新空氣，陋巷豈真老我羞。
檻外雞江堆錦繡，窗前獅嶺綴花毬。文明此地先輸入，卜築初心為是謀。⁽⁷⁾

在這首賀詩中，顏笏山極力稱頌顏雲年新築外觀的美輪美奐，以及住宅環境的幽美，尤其「新空氣」、「文明」二詞之稱揚，更顯現出新宅的變革與進步。

透過上述諸例，可見「新頭腦」、「文明頭腦」，不只是眾人所汲汲營營追求的目標，也是人物品評月旦的標準所在，更是對後輩子孫的殷切期望；而「文明」一詞，頓時成為時代中人的維新話語，一切事物率以此為進步與否的衡量標準。正因如此，尤養齋〈文人模範論〉在陳述文人有何可為後世取法之處時，更將「鼓吹文明」列為五大端中之第二項目，足見時人視此為要務。⁽⁸⁾此外，尚有若干傳統文人感於時代風氣，而有集體推動新學之舉，明治三十九年（1906），羅秀惠、王慶忠、黃茂清、謝汝銓、李漢如……等人，便糾集在臺北創立一「新學研究會」，準備推行運動，以提倡新學，一時入會之人，竟高達一千五百餘人；其後，因事務主任李漢如赴閩創設《全閩報》而暫停會務，迄明治四十三年（1910）歸來，才重起爐灶，並於是年出刊《新學叢誌》第一號。後人回憶此刊物之內容，計有法律、政治、經濟、歷史、地理、衛生、哲學、文學各種講義，並附有詩海、小說，雖然今日吾人已不復見此刊，但從上述內容看來，亦不難想像昔年傳統文人追求新式文明之跡。⁽⁹⁾

(二)新式科學文明的魅惑

對於這些傳統文人而言，現代文明何以頓時成為眾人追求與努力的目標？「文明」為何深深激盪著這群來自傳統封建社會菁英份子的心靈？吾人從彰化舉人吳

(7) 顏笏山，〈敬賀雲年宗兄新築落成即次瑤韻〉，《臺灣日日新報》，第4465號（大正元年11月6日）。

(8) 參見尤養齋，〈文人模範論〉，收於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卷三（嘉義：蘭記圖書部，1927），頁2。

(9) 以上關於「新學研究會」及《新學叢誌》之介紹，參見文瀾，〈從「揚文會」談到「新學研究會」〉，《臺北文物》8:4（1960年2月），頁39-42。

德功的親身經歷，或能略窺一、二。

明治三十三年（1900）三月十五日，臺灣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在臺北舉辦「揚文會」，吳德功於數日前乘坐火車北上與會，並撰就了〈觀光日記〉一文，⁽¹⁰⁾除記載沿途旅程外，文章焦點大抵在於會議內容的描寫及會後參觀心得的陳述，尤其是所見所聞的若干西洋事物，更是大大震懾了其人心靈。此次行旅，明顯可見日人的機心設計，包括住宿飲食的安排、餘興節目的準備、會場景物的布置，都洋溢日人色彩與西洋精神，而各種新式器物與制度的展現，更是凸顯日本有別過去統治臺灣的母國「中國」的「現代化」本質。在旅遊中，吳德功獲見備有鋼線砲、魚雷的戰艦，以及警察獄官學習所、練習武藝所、獄吏生練習所、警察生練習所，親身體會了象徵國家威權體制的軍力與警備的強大；而參觀製藥所、製洋煙所、電火所、樟梘製造所，則是目睹科技文明的新異；自來水的製造、衛生課內藥水實驗，促使先生大開眼界，後者更讓其感嘆化學之理的奧妙；病院、配藥室、死屍陳列室、時疫病室，見識了西方醫學的進步；商品陳列所、郵便局、電信局，俱是現代化設施；而總督府國語學校、度量衡調查所、覆審法院（當時正審查抗日份子簡大獅），乃至銀行條規的說明，皆是體現現代國家教育、經濟、法律精神的代表產物。顯然地，日人透過「揚文會」的召開，邀請這些臺灣過去擁有科舉功名的秀異士子薈萃一堂的動機，豈僅是「敦世風，勵績學」，或「會設揚文，搜羅臺疆俊傑之才，聿贊國家文明之化」⁽¹¹⁾而已，其真正用意除了是在安撫籠絡臺灣菁英份子之外，更爲了展示日本的國家集權威勢與現代文明的進步面目，這才是統治策略的運用。

此趟北上之旅結束後，返鄉途中吳德功與會友暢談「揚文會之盛」，且頌讚日人「禮意甚厚」；⁽¹²⁾不過，藉由吳德功的書寫，我們深刻感受到臺人既「驚懼」又「欣喜」的心情，特別是現代化事物、制度的文明召喚，正魅惑著從舊社會過渡而來的知識份子，吳德功一面嘆服會場內外所參觀各類現代化事物的靈巧與便捷，一面則推許這些文明變化將會造福臺灣百姓，於是寫下如斯的語句：「甚爲靈巧」、「不亦簡而該哉」、「本島開風氣之先」、「欲開本島人之智慧」、「引會員展玩

(10) 吳德功，〈觀光日記〉，收於氏著，《吳德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67-188。

(11) 同上註，頁167。

(12) 同上註，頁188。

以廣眼界」、「製造之敏捷，於此可見」、「功省利溥，真令人不可思議哉！」、「俾全島除積弊，式煥新猷云。」……。透過以上吳德功碰觸現代化事物經驗的驚奇欣喜寫照，充分流露了舊時代傳統知識份子，對於新時代文明的高度興趣與期待。

當追求文明成了當時文人的急迫要務時，對於若干有幸前往日本觀光或留學的人，能夠就近接觸更多文明事物的經歷，自然更加成為旁人豔羨的對象。明治三十六年（1903），王石鵬作〈送蔡君汝修赴大阪序〉一文，對於蔡汝修往赴大阪參觀博覽會之行，給予高度評價：

今大阪之開博覽會也，實足為本島大放光線。吾聞此會場之陳列也，分為十部，自農業、園藝、林業、水產、採礦、冶金、化學、染織、製造等工藝，以至機器、教育、學術、衛生、理財、美術等諸品及古代遺物，蒐羅甚富。……蔡君年少氣英，經濟之學，素蓄於胸中，客歲獨予所譯農學一書，謂其可以助島民殖產之進步，殷殷致意其志可知。頃大甲織席會社，及中部臺灣日報之設，君亦與有力焉，人多以事業家目之矣！且其口才便捷，能操國語，其與國人往來酬答，既無扞格之虞，目之所觸，心能會之，入此大智囊中，當必有所取擇。此一行也，學問智識，所益良多，異日載筆旋歸，必為本島振興實業，造四百萬同胞無疆之福，豈徒誇遊歷名區，飽嘗風月而已哉？予因有事入閩，恨不得與子同舟。……(13)

王氏在文中想像著大阪博覽會的各種實業文明設施，並欽羨蔡汝修能有實地考察的機會，他不將蔡氏此行視為觀光旅遊的純粹娛樂，而以為「博覽會」與「現代文明」及「全島實業」、「同胞幸福」諸事關係密切，因此對於「赴日觀光」也就寄予厚望，甚至強調若非自己有事纏身，否則「恨不得」也能前往，期盼之情溢於言表。

從上可見，傳統文人對於現代文明的期待，尤其是科技產物的實業文明，多數充滿高度嚮往與推崇。(14)

(13) 參見王石鵬，〈送蔡君汝修赴大阪序〉，《臺灣日日新報》，第1489號（明治36年4月21日）。

(14) 在推崇與嚮往之外，當然也有若干文人對此存有選擇性接受或抗拒的思考模式，如洪棄生、林鍾英……等。

(三)西洋文明 vs.東洋文明

在臺人眼中，誠如上述，物質文明的現代化令人吃驚與迷惑，更使臺人對於西洋國家刮目相看，形塑了科學文明的先進國家形象。爲了避免臺人忽略東方國家，尤其是中國科學發明的歷史意義與價值，連橫在參加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夜臺灣文化協會臺北支部第四十四回通俗學術土曜講座時，發表了「東西科學之比較的演講」（後改題爲「東西科學考證」），⁽¹⁵⁾ 特加說明：

夫世界有兩大文明：一曰東洋文明，一曰西洋文明。近時人士，或以東洋文明爲精神的，西洋文明爲物質的，鄙意不然，精神之外亦有物質，物質之外亦有精神。不過東洋較重精神而輕物質，西洋則較重物質而輕精神。……東洋學說以孔子爲宗，……不言物質。老子之無爲，莊子之自然，墨子之節儉，對於物質且排斥之。而西洋爲個人主義，是以羅梭之自由，邊沁之功利，康德之幸福，斯賓塞之優勝劣敗，多趨重物質。此其所以異也。……夫東洋非無科學。吾以中國舊籍所載者摘其一二以供研究，亦可爲今日之考證歟。……唯我臺灣當此新舊遞嬗之時，東西文明匯合若一，我臺人當大其眼孔，……採彼之長，補我之短，以發皇固有之科學，或且凌過西人，……至於精神、物質兩方面，如車兩輪，不可偏廢……。⁽¹⁶⁾

顯然地，連橫意欲消弭東洋與西洋文明間有關「物質文明」差距的刻板印象，進以鼓舞臺人從事科學文明的探究動力，同時更勉勵臺人在新舊遞嬗時代，須求東西文明的匯合，取長補短，兼重精神與物質，通篇可見作者之用心。但若從另一角度言，則恰恰可證當時臺人對於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的確有著逐漸二分的區別性評價與看法。事實上，這種西洋文明與東洋文明二分對立的情形，早已有之，且在精神文明方面更爲顯著。

日治時期的臺灣，透過日本與歐美見識了新式科學文明，但在物質文明之外，

(15) 參見鄭喜夫編撰，《連雅堂先生年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18-119。

(16) 參見連橫，《東西科學考證》，收於氏著，《雅堂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17、23。

精神文化也相繼進入臺灣，對此，傳統文人頗多出現了抗拒與排斥的情況，與面對西方科技文明時通盤接受的態度大相逕庭，甚而強調西洋精神文明與東洋精神文明的差異對立。

林維朝在回顧大正七年（1918）彰化文人創立「崇文社」的動機與背景時，說明了該社的成立與西洋精神文明強勢挑戰的危機有關，他說到當時臺灣社會的情景：

世之變也！異端邪說隨歐風美雨以俱來，西人唾餘之糟粕，奉為金科；東方固有之文明，棄同敝屣。狂妄者倡之於前，喜新者和之於後，炫異矜奇，毀禮蔑義，世道日見其凌夷，人心日流於險惡，有志優時之士，莫不怒焉傷之。……(17)

在這段文字中，林氏憂心臺灣社會本質丕變，人心世道衰夷，以為根本原因就是「異端邪說」的西洋精神文明所致，促使臺人忘卻東方固有文明。而同時期，黃茂盛〈崇文社百期文集序〉一文，也有相近的思維：

自歐風東漸，莘莘學子群尚時趨，講倫理則視為具文，談經學則斥為腐論。漫唱自由平等，非孝非慈，怪象紛呈，風潮迭起，幾乎非盡廢先王之禮法，挾名教之藩籬不已。……(18)

黃氏留意西方精神文明浸染臺灣的問題，特別指出所謂自由平等、非孝非慈的學說，對臺灣禮法名教的破壞。

再者，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的較勁，也連帶激化了新學、舊學間的競爭，林湘沅寫於大正八年（1919）的〈祝臺灣文社發刊第一號文藝叢誌〉一文，對此表示憂慮，其言：

本島沐文明之化，垂二十有三年，居民競尚維新，文人學士，殆如晨星

(17) 參見林維朝，〈崇文社文集序〉，收於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頁11。案，「崇文社」是日治時期臺灣第一個成立的「文社」，取「崇文重道」之意，由彰化文人黃臥松於1917年發起創設，1918年起加入仕紳吳德功、楊吉臣……等，並於本年開始課題徵文。另，本處引文，原無句讀，新式標點為筆者所加；又，若干原有舊式句讀之文字，為求便利閱讀，筆者亦改為新式標點，以下皆同。

(18) 黃茂盛，〈崇文社百期文集序〉，同上註，頁1。

寥落。新學日興，舊學於焉否塞，大勢所趨，固亦無可如何也。但新學為文明之利器，舊學乃人道之大原，如日月經天，豈容偏廢？是則居今之世，得新未可忘舊，固不待辯而自明矣。然而舊學之衰，於今為烈，早為有識者之同慨。……⁽¹⁹⁾

在林氏的觀察中，日本據臺以來，居民由於文明之沐化，因此競尚維新，在大正初期，臺灣社會中已呈現新學日興、舊學漸衰的趨勢，令舊學之擁護者頗感憂心。而舊學為何？其實就是「漢學」，莊子淵發表於大正九年（1920）九月的〈維持漢學策〉一文有言：

……今中國積弱已甚，外患頻仍，敗於東，喪於西，失其地，棄其民，幾不成其國，故文學因之而微，遂使孔孟之道，等於弁髦；天人之學，輕如敝屣。彼新學者流，竟藐之為舊學，視之為畏途，聲類相應，公然附和。今日議廢之，明日議滅之。噫！漢學也，而可廢乎哉？……⁽²⁰⁾

「舊學」即「漢學」，其內容包涵中國傳統文學、孔孟之道、天人之學……等。那麼「新學」的內容如何呢？許子文〈維持漢學策〉曾加言及：

……群思趨向新學，遂相率輸入西洋之化，凡自由、平等、戀愛、共和、利己、樂天諸種學說，盛行於世。……改隸以來，學校如林，有大裨於人生，……教育學與政治學……，……哲學，……法律學、行政學，……倫理學，……社會學及自然科學，……交涉學，……氣象學，……種植學，……化電光汽，……新學之地球幾何……。⁽²¹⁾

相較莊子淵之文，此處所論新學內涵，即西洋文化各類學說與學術，而新式學校之授課，大抵以此為宗。

在新時代下，舊學／漢學因為新學之日盛而受挫，導致出現反抗排拒西洋文明的聲音，但在面對時代變遷時，文人實際也能注意到新、舊學間相容並蓄的重

(19) 林湘沅，〈祝臺灣文社發刊第一號文藝叢誌〉，《臺灣文藝叢誌》，第一號（大正8年1月1日）。

(20) 莊子淵，〈維持漢學策〉，收於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卷一，頁39。

(21) 許子文，〈維持漢學策〉，同上註，頁32、33。

要性，是以黃爾璇在鼓吹漢學之際，誠懇呼籲：「萬里歐風捲地來，自由聲裡轟如雷。……取長補短仗賢能，新學舊學兩無間。……」⁽²²⁾ 希望兼顧新學與舊學，而二者則能相互涵容無間；而新竹富豪黃戒三兄弟，更是鑑於時勢，早在明治三、四十年間，就延聘新學有得、舊學不背的教諭訓導如黃世元、魏清德等人來教授子弟，成效卓著，一時傳為美談。⁽²³⁾ 又如羅秀惠〈漢學保存會小集敘書後〉一文，雖為保存漢學而作，但作者也承認：

……孔子所言溫故而知新一語，實為千古教育學之準繩。所謂故者，非陳腐頑固之謂也，蓋西學之才智技能，日新不已，而漢學之文字經史，萬古不磨，新故相資，方為萬全無弊。……⁽²⁴⁾

在現代社會下，「新故相資」，才是當前教育的最高準繩。

以上透過時代背景的勾勒，吾人可以發現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四年間新文學典律問題被熱烈提出討論之前，臺灣社會逐漸步入一嶄新的時代。相應於時代的變化，臺灣傳統文人已然浮現維新的思考，追求文明、新頭腦與新氣象，成為普遍共同肯定且接受的事實，如此以「文明是尚」的社會氛圍，對於日後臺人面對以迎合世界新潮流為務的新文學的興起，無疑在心態上是較易理解與接受的，對於新文學的醞釀成形，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只是在目睹精神文明的新變時，若干傳統文人為求鞏固倫理道德的地位，而提出摒棄西洋文化的呼籲，或者斥為異端，甚而在面對新學教育的來勢洶洶，舊學／漢學地位備受挑戰與威脅時，也出現急迫維護之聲，力謀振作之舉，多少有礙新文學之發展；不過，新、舊學的緊張對峙，雖然遏阻了新學快速壯大的聲威，但隨著新學教育的愈見普及，以及高倡新、舊學兼容並包論調的出現，都將為未來新文學的誕生鋪路與奠基。

三、革新與啓蒙：舊文學界的改良之路

一九二〇年，陳炳的〈文學與職務〉一文，言及「今日之形勢，當使文學自

(22) 參見黃爾璇，〈祝臺灣文社成立〉，《臺灣文藝叢誌》，第一號（大正8年1月1日）。

(2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第7150號（大正9年5月7日）。

(24) 羅秀惠，〈漢學保存會小集敘書後〉，《臺灣日日新報》，第2150號（明治38年7月4日）。

覺，勵行其職務，以打破陋習，擊醒惰眠，而就今日之文明思想，以為百般革新之先導為急務也。嘗聞我臺有文社〔按：即臺灣文社〕之設，已經年餘有光彩之歷史矣，想對此方面，必大有貢獻，固毋庸贅也。〕⁽²⁵⁾ 在這段簡短的文字中，吾人可以發現，作為臺灣新文學運動前驅之一的陳炳，並未全盤否定舊文學的存在，甚至肯定設置年餘的傳統文學團體「臺灣文社」，早已扮演引進文明思想的先導角色，有利於新文學興起的貢獻，⁽²⁶⁾ 顯見陳氏已經密切注意到舊文學界在「過渡時代」裡所發揮的作用。

那麼，「臺灣文社」究竟有過何種自覺的言論呢？又除此之外，其他舊文人是否也曾思索過舊文學在文明時代中要如何進行改良或革新呢？以下透過當時具有一定影響性之報章雜誌、出版品所載的相關言論，加以說明。

(一) 詩歌內容的改革

1.

一九〇七年，連雅堂曾在《臺南新報》上倡議「臺灣詩界革新論」，⁽²⁷⁾ 強力表達其對「擊鉢吟」的不滿，他認為「擊鉢吟者，一種之遊戲也，可偶為之而不可數，數則詩格自卑，雖工藻績，僅成土苴，故余謂作詩當於大處著筆而後可歌可誦。」⁽²⁸⁾ 關於此舉，由於缺乏更清楚之記載，因此無法得知連氏是否受到晚清詩界革命風潮之影響，或實際有感於時代變革所需而發？但或可視之為臺灣詩界革新的先聲。

2.

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魏清德曾經發表一場題為〈詩及國民性〉的演講，而後又將演講內容摘要刊登於《臺灣日日新報》上以廣為週知：

(25) 陳炳，〈文學與職務〉，《臺灣青年》1:1（1920年7月），頁43。

(26) 類似的評價，日後也見諸於楊雲萍；參見楊雲萍，《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臺北：臺灣風物，1993），頁579-601。

(27) 參見連橫，〈餘墨〉，收於氏著，《臺灣詩薈》下，第19號（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60，附錄三。依照連橫該文所述，其人提出「臺灣詩界革新論」的時間，至遲不晚於1914年，而施懿琳則明確指出係在1907年，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臺灣古典詩壇的影響〉，收於氏著，《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頁256。

(28) 文見連橫，〈餘墨〉，頁460。

國民性之消長，詩亦與之消長。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數島の大和心を人間はば朝日に匂ふ山櫻花）此詩具有日本國民性之表現，漢詩數千年作者不少，可惜無國民性表現之詩，此後所宜改良者。為排去陳腐，應時勢之要求，詩之本領，不獨為精神界之慰安，將以高尚國民之品性，改造國民之精神，不然則作詩不如耕田，內地人之格言，余亦深贊成其說……。（29）

魏氏認為應現代時勢需要，詩歌的內容與精神必須排去陳腐，作一改良，要以能在詩中呈現國民性為要務，進而高尚國民性，改造國民精神。如此看來，此等深深期盼舊詩能夠成為改造「國民性」利器的情形，與後來新文學家要以白話文的新文學典律來啟蒙大眾，提升百姓素質以迎合現代化社會，用心並無二致。

3.

除了上述舊文人本身面對新局的個別想法外，在新舊文學論戰發生前夕，臺灣恰有兩份詩刊發行，其一是連橫的《臺灣詩薈》，另一則係臺北星社同仁黃春潮、張純甫等人所編的《臺灣詩報》，後者較前者早些時日出版。令人玩味的是，這兩份詩刊創刊號上之序文，均不約而同地對臺灣詩壇提出建言。

連橫〈臺灣詩薈發刊序〉云：

今日之臺灣，非復舊時景象也。……夫以新舊遞變之世，群策群力，猶虞未迨，莘莘學子而僅以詩人自命，歌舞湖山，潤色昇平，此復不佞之所為戚也。……小之為拈雅揚風之篇，大之為道德經綸之具，內之為正心修身之學，外之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我詩人之本領，固足以卓立天地也。不佞騷壇之一卒也，……手此一編，互相勉勵，臺灣文運之衰頹，藉是而起，此則不佞之幟也。（30）

(29) 魏清德，〈詩及國民性〉，《臺灣日日新報》，第5405號（大正4年7月8日）。只是魏清德偏向於日本國民性論述的思維模式，不免陷入政治化現代性，拙文〈傳統與維新：《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啟蒙論述〉有進一步的闡述；黃美娥，〈傳統與維新：《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啟蒙論述〉，發表於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心暨中文系主辦，「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11月8-9日。

(30) 參見連橫，〈臺灣詩薈發刊序〉，收於氏著，《臺灣詩薈》上，頁1-2。

連橫有鑑於西力東漸，漢學衰微，因此勸諫詩人不能以潤色昇平的詩人自命，更要撰寫化育風雅、翼贊道德，又能寄寓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的作品，如此才能發揚臺灣詩界的天聲。

另一份詩刊《臺灣詩報》，也出現了反省的聲音，林石崖〈臺灣詩報序〉云：

古詩三百篇，……義旨奧妙，以十五國風言之，……於政治經濟，人才風俗，沿革得失，指陳詳審，後人讀之，勃然感奮，故詩之所以可貴也。是後王風委頓，大雅不作……此雖或運會使然，要非詩人所見不大之故歟？近世歐美詩人則反是，其文藝之醇者，一本於哲學，凡所賦詩，不寫國家之政象，則描民族之心理，如俄之託爾斯泰、印之泰古俞者，使人誦其詩，讀其說，可以察其社會千變萬幻之情狀矣，蓋其學不離乎社會，而措辭命意，又務以指導人心，改造時勢，此詩人之偉大，所以能後杜少陵，而為詩聖也。嗚呼！詩人所學如是，抱負如是，相勗如是，縱偶飲醇近美，試為綺語豔詞，又何損其大節乎？若夫萬卷不讀，見解不宏，日唯浸淫於章句之間，沾沾然，搜奇抉怪，以與鄉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分寸毫厘，爭一時之長短，抑卑卑不足道矣。……諸君子誠權其輕重，別其小大，以通聲息，以刊詩文，則《臺灣詩報》之有補於學界，有造於社會者，又豈淺少也哉？⁽³¹⁾

文中，林氏以中國《詩經》與俄國託爾斯泰、印度泰戈爾的作品為例，說明可貴的創作必然與社會相連結，且以指導人心、改造時勢為務，而非徒於章句上爭一時的長短。從林氏的意見及其對《臺灣詩報》的期許，可以發現林氏對於國外的文藝也有所接觸，甚至認為其中大有可以借鏡之處，並謂臺灣的創作，應該致力於「社會性」的彰顯。

綜觀前述，可以發現，臺灣的舊文人在面對新時代、新的社會文化的變遷與挑戰時，曾經嘗試進行詩歌改革，先是魏清德演講宣傳提升改造「國民性」之必要，而後又有連橫要求當發揮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作用，林石崖則是強調詩歌的社會性意義與價值，其共同點，就是他們不以章句之美為務，而更要在內容上作一

(31) 參見林石崖，〈臺灣詩報序〉，《臺灣詩報》創刊號，大正13年2月6日。

革新，以迎合時代文明。

(二) 散文書寫的求變

由於漸臻文明之故，日治時期的臺灣文人清楚瞭解在漢文之外，尚有他國文字／文學的存在，而世界正處於各國文字互相溝通交流的時候，於是洞達時勢的有智之士以為：

第思學不拘乎今古，地無限乎東西，不觀夫生長亞洲之人，萬里裹糧以學歐語歐文者乎？又不觀夫生長歐洲之人，萬里擔簦以學漢語漢文者乎？地球之上，無論遐邇，舟車可至，必有交通，因乎彼此之交通而知彼此之語言文字不同，遂互生不便之感；且因乎彼此之交通，而知彼之語言文字有優於此者，此之語言文字有優於彼者，而後知彼之語言文字有優於此者，遂互生其向學之心，此勢之所以必至而不足怪也。由是觀之，為此國之人只求此國之學，而不更求他國之學者，其亦拘泥之甚矣！夫以歐洲之語言文字，因時制宜，且不可不學，而況於漢文乎？漢文者，數千年來……極高尚之文章，最優美之文學也。……(32)

此文雖然旨於鼓吹重振臺灣之漢文學，但尤耐人尋味的是，撰述者是從世界的位置來說明臺灣漢文的重要性，並且暗示臺灣之漢文學已難自阻於他國之外，將與他國關係密切。

那麼，他國語言文字及文學作品，可以為漢文寫作帶來何種影響或啟發呢？一九一九年，魏清德在〈祝臺灣文社發刊之詞〉中，提出了具體想法：

世界之文運大開，……漢文猶有遺憾，方諸歐文似稍欠明晰，難於闡明一切，若能參加外國科學上術語譯之成詞，藉以介紹今世文化，使毫髮畢呈，則庶幾哉！其用統分為二，一為實用之文，二為美文。實用之文，即日常所用及介紹科學，貴淺易明晰，遇有複雜細微之處，不妨迂迴剖出，夫煩碎勝於囫圇，囫圇則不能闡明一切，使文化滯而不行。美文即

(32) 不著撰人，〈臺灣文社設立之旨趣〉。

歌詩詞賦，導人於靈性之域，其措辭可歌可喜，可興可泣，欲勒石不厭古奧，欲形容不厭誇大，欲頌揚不厭莊重，欲鞭撻不厭激昂，欲哀訴不厭沈痛，……凡此數者，皆與日用之文有別，專門家之職也。……⁽³³⁾

相較歐文作品之後，魏氏發覺漢文寫作「稍欠明晰」的缺點，因此建議在創作語詞上，可以採用新詞彙，參考外國科學上的術語來介紹新文化。另外，鑑於時代文明之所需，更提出將漢文分為二類的作法，一類為日常所用及介紹科學的「實用之文」，二為導人靈性的歌詩詞賦的「美文」，透過現在所謂「散文」與「韻文」體類之別，來達成不同的文學訴求，發揮各自的特色。此處魏氏的想法，呈顯了他已思考到文字與文學形式、文學內容間的關係。

(三)小說與戲劇的改良

一九一八年，許子文〈維持漢學策〉言及：「文明有三利器，曰演劇，曰小說，曰新聞……」⁽³⁴⁾可見小說與演劇的社會功用頗受當時臺人的看重。而一九二〇年，楊肇嘉參與崇文社徵文之作品〈戲劇改良論〉亦持相同看法，且更針對戲劇的重要性加以闡述：

文明之利器有三，演戲亦居其一，蓋開化之道，與新聞同功也。聞知歐西各國，多有利用演戲，喚醒愚人之迷夢，以作社會之木鐸。故國家之舉動，官僚之行爲，萬眾之作事，苟有一二劣跡，今日事未行，明日戲已演，不惜談言微中，出隱語以寓勸規，冀挽回當世之醜劣，……我臺而欲改良戲劇，舍此奚法？……⁽³⁵⁾

文中以歐西各國爲例，高度肯定戲劇具有開化社會、喚醒民愚的妙效。

但，「小說」與「戲劇」如何才能真正落實爲啓蒙民智、沃灌文明的利器？於是，檢討過去舊有文藝表現的缺失，遂成首要任務。在傳統文人眼中，斯時小說與戲劇均已出現弊病，較大的弊端有二，其一是迷信，其二則是流於淫穢，彰化

(33) 魏清德，〈祝臺灣文社發刊之詞〉，《臺灣文藝叢誌》，第1號，頁3。

(34) 許子文，〈維持漢學策〉，收於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卷一，頁35。

(35) 楊肇嘉，〈戲劇改良論〉，收於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卷三，頁53。

崇文社在大正七年（1918）所舉辦的多次徵文中，批判反省之聲遍存於〈破除迷信議〉、〈淫戲淫書禁革議〉、〈風紀維持策〉等，可見時論深刻體認了小說、戲劇的良窳實與社會文明密切攸關；大正九年（1920）五月，崇文社甚至直接以〈戲劇改良論〉，對外展開徵文活動，其欲改革戲劇之心，清晰可見。

但，革新之路當如何開始呢？許子文嘗有「禁小說，定演劇」之議，其以為：

小說之書，所述迷信者甚多。然既能識字，則文理粗通，必不為其所迷，獨有目不識丁者，閒暇之時，偏好聽小說，且好聽小說之最大迷信者，如封神、西遊……，有志者宜出一提倡，……而以我國古今事實之史蹟，編而為書，刊行於世，……普及地理歷史之觀念。……今之演劇，即古樂之遺也；今之詞曲，即古詩之意也，然古之詩樂，粹然一出於正，而今之劇場詞曲，皆不可為訓，……如遊地府、鬧天宮、鬼門關尋母、牛魔王招親，奚足以供人之迷信。吾人而欲追求古樂之聲，以成國民之性，何如仿我國古詩樂之遺意，聚名儒於一堂，取今之所謂劇場詞曲者，較而訂之，凡為迷信之害概為禁絕，而其所編撰成曲，施行全島者，必皆古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可歌可泣可傳之事。……(36)

許氏之文，本專為破除迷信而作，不過在其觀察中，小說與演劇常是迷信孕育傳播的淵藪，因此倡議改革小說與戲劇，究其革新方向，誠如上述，係建言採用具有真實性基礎的「我國古今」事實的史蹟，或編書出版，或演講傳播，藉以替代往日的說書、聽書中虛妄迷信的成分，並進一步普及百姓地理及歷史觀念，提升民族精神，達到教化作用；另一方面，在戲劇改良上，則是主張回復「古詩樂之遺意」，透過召喚「古樂」「粹然純正」的靈魂，淨化人心。

不同於許子文以復興「古樂」精神來改革戲劇現況，同是臺南人士的許氏美玉獨標新旨，則是從戲劇的表演本質與美感呈現著眼；並引入現代文明，企圖轉化原先不良的劇情精神，其言：

天地有春夏秋冬，人生有喜怒悲慘，戲劇乃觸人生之喜怒悲慘，而改良

(36) 許子文，〈破除迷信議〉，收於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卷一，頁16。

宜法天地之春夏秋冬。春，喜劇也，……夏，怒劇也……，秋，悲劇也……，冬，慘劇也，……。演戲者，喜劇而以春為象，怒劇而以夏為象，悲劇而以秋為象，慘劇而以冬為象，……。今我臺之戲劇何如耶？……如長生樂、百歲坊，戲劇之喜也，而觀者不能博采；打嚴嵩、斬延壽，戲劇之怒也，而演者不能傳神；丞相拜斗、夫人祭江，戲劇之悲也，而舞臺不盡景；先王託孤、建文棄位，戲劇之慘也，而音樂不拍合，是皆未改良也。……文明之器，非不利也，而孰謂戲為小道？言改良者，慎勿以戲劇置之度外也。今宜度其緩急，先其不良者而更張之，……若長生樂，不以仙丹為寶，而盡力於衛生；若百歲坊，不以顯者為貴，而成功於勞動；若買胭脂、賣火炭，猥褻之處，削而除之，戀愛之精神而化之；若誅仙陣，易以當代理化之實驗；若打擂臺，改以我邦角力之實習，……若託孤位，極言愛國忘家之氣概。……(37)

以上許氏之文，內容可分為二，前半旨於敘述當今戲劇之「不良」現象，從戲劇風格的營造，到演員表演能力、舞臺背景、音樂曲拍的缺失，一一陳述；後半則提供具體「改良」之道，針對不合現代精神的劇情，轉以符合現代文明的方式表達，以新御舊，達成改革目的。通篇思慮縝密，在在可見論者之新思維。

另外，關於小說方面，「改良說部」亦是時人的共同體認，但當如何進行？一九二一年，《臺灣文藝叢誌》曾經刊載中州逸民〈論小說家宜注重遊歷〉一文，頗有度人金針之意，文章大要如下：

……他人而不能盡知天下事，猶可無妨，若小說家則斷乎不可不知，益既已稱為小說家，不可不深悉社會情狀，而吾國之社會情狀，則各地不同，不深歷其境，則烏從而深知乎？小說為通俗教育之一端，人所共知也。既言通俗教育，當然有移風易俗之責，而移風易俗之最有功效者，莫社會小說若。社會小說在小說界中，實占第一重要位置，試問不知社會情狀者，能撰社會小說乎？……其次，小說之作法，求文勝不如求意勝，文勝猶易，意勝則難乎其難。……就意勝論，唯社會小說獨易，蓋

(37) 許美玉，〈戲劇改良論〉，收於黃茂盛編，《崇文社文集》卷三，頁54-55。

社會之情狀，高高下下，奇形異態，……他種小說之造意，或有時而窮，唯社會小說，則雖萬卷千帙，亦可紀述不盡。……再次，小說家之心胸，宜開拓而不宜鬱結；小說家之頭腦，宜清新而不宜陳舊，……不可不藉遊歷之力，以開拓其心胸，清新其頭腦也。復次，遊歷之益，不獨有助於社會小說之資料，無論何種小說，必有敘地點寫風景之處，著作既多，需材愈廣，……更次，如吾遊蹤所至，見聞最奇者，莫如汴之涉縣、魯之德縣，所見之人，幾無一不從十八世紀中來。試撰一言情小說，而謂涉縣地方，而有才子佳人，合於理乎？試撰一偵探小說，而謂德縣地方，出一科學奇案，又合於理乎？是非深入其境，目睹其狀，又烏知其不合於情？……(38)

本篇出自中國文人之手，撰者旨於論述作家行旅經歷與創作的關係，他主張小說不是杜門著書的結果，作家必得有一定的見聞經驗，才能寫物寫景得宜，內容入情入裡；文中又肯定小說具有移風易俗的作用，並特別標舉社會小說的重要地位。此文藉由論者的經歷談起，探討作家、作品與社會、環境間的可能辯證關係，析論明確，是以《臺灣文藝叢誌》刊登此文，當是期望藉此有助於革新臺灣之小說界；而其中極力推崇「社會小說」的撰寫，更隱然遙應了數年後臺灣小說創作以此為主流的事實。

(四)引介島外思潮

文學創作既要順應世界潮流以提升國民精神，則創作時應當怎樣進行？又要如何汲取新的世界文明呢？目前的研究者，在肯定新文學家推廣新文學運動時，常會稱讚其人引介西方文明思潮及文藝理論的努力，但實際上，在新舊論戰發生前，甚至在一九二〇年具有啓蒙奠基作用的刊物《臺灣青年》之前，舊文人早有翻譯島外作品之舉，茲以「臺灣文社」之關係刊物《臺灣文藝叢誌》為例，加以說明。

一九一八年十月，由樂社同仁林幼春、蔡惠如、陳滄玉、林獻堂、林子瑾……

(38) 中州逸民，〈論小說家宜注重遊歷〉，《臺灣文藝叢誌》，第三年第七號，頁8-9。

等十二人所倡立的「臺灣文社」，在其設立旨趣中，便強調世界各地距離雖遠，但彼此漸能交通往來，世界已成開放之勢，所以處於當下之人，在學習時要不拘古今、不限東西。⁽³⁹⁾ 因此，隔年元月在其社內刊物《臺灣文藝叢誌》⁽⁴⁰⁾（其間曾改版為《臺灣文藝旬報》，後又改為《臺灣文藝叢誌》月刊）出版之後，就常介紹許多外國局勢、西方新文明以及國外文人著作的概況，如第一年第一號有林少英翻譯英國 JOHN·FINNEMORE 的〈德國史略〉、則以譯〈夏目漱石傳〉；第一年第四號林少英譯英人 LUCY·CAZALET 之〈俄國史略〉；第二年第四號有許三郎翻譯德富蘇峰的〈生活之意義〉……等；《臺灣文藝旬報》第十四號載有世英〈太歌爾氏之人生觀與世界觀〉、第十八號河上肇著、楊山木譯〈現代經濟組織之缺陷〉……。

大抵，從《臺灣文藝叢誌》上引介島外思潮看來，內容形形色色，範疇廣泛，是皆有利開拓臺人知識視野，掌握世界脈動，快速吸收西方文明；所以面對其所扮演的啓蒙大眾的「先鋒」角色，陳炳與楊雲萍都給予了正面而肯定之評價。

以上，筆者透過相關史料，勾勒出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四年新舊文學論戰發生之前，由於西學東漸，現代事物紛起，在新時代的刺激下，傳統文人其實已經對於舊有的文學典律產生一定的反省，他們期許文學內容可以與時俱遷，符合需求，相關改革言論，大致涵蓋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方面，另外也曾借鏡中國文學創作經驗及西洋文學思潮。細繹此一文學歷史軌跡，說明了現代文明引發了臺灣傳統知識份子的變革意識，不只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感受正在改變，臺人生活與思想的變革也影響了文字的表達，為求更適切詮釋與時俱變的思想感情與社會生活，文學也必須進行改良；於是，舊文學界所曾出現的各式改革言論，雖然不是一連串集結性、有計畫的鼓吹行動或集體風潮，但隨著相關言論在報章雜誌上的傳播，促使變革意識的擴散與積澱，加上若干文學改良思維，實在具有向「新文學典律」的精神內涵靠攏的傾向，因此即使缺乏「趨新」的口號，卻已然為未來新文學的興起發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現實基

(39) 參見不著撰人，〈臺灣文社設立之旨趣〉。

(40) 關於臺灣文社及《臺灣文藝叢誌》成立、發刊的大致情形，可參見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 1919-1923 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標社成立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2001 年 12 月 8 日。

礎。

更何況，尚有舊文人公開鼓吹支持新文學運動，如櫟社詩人林子瑾在一九二二年在《臺灣文化叢書》第一號上所發表的〈文化之意義〉一文，以同屬海洋文化的希臘文學作為臺灣文學的借鏡，呼籲「鄙見於臺灣文藝界，當有一番革新，以改從來古文體為白話文體，或用羅馬白話字代之，使一般之人容易讀之，又對詩之一藝大為推進，則臺灣文化受此之助，其向上之勢，當一瀉千里也。……」⁽⁴¹⁾在新舊文學交替階段，林氏此文頗具意義，代表了舊文人中已經出現有贊成新文學的聲音，林瑞明教授甚至以為賴和、陳虛谷等第一代臺灣新文學作家，可能曾經受此啟發與影響。⁽⁴²⁾因此，倘若用新、舊對立的關係化約看待當時傳統文人面對新文學時的態度，將會疏漏了其間存有的不同聲音與表現。

四、在新與舊之間——過渡時代下的文學創作

誠如上述，面臨時代新局，傳統文人思索著文學的改良之路，陸續提出諸多改革意見；另一方面，在實際創作上，若干作家也自覺地將新知識、新思想融貫於作品中，努力描寫新事物，遂使作品的題材觸及前所未見的面向，書寫範圍也擴大了。首先，在語言及文學形式方面，為了表現新事物與新學理，作品中使用不少新名詞，文學語言更顯通俗易懂；此外也引進、模仿西方文學創作技巧及文類，對舊文學的樣式有所突破，更加豐富文學的表現力。

(一)

例如詩歌方面，李碩卿發表於大正元年（1912）的〈七夕書感〉四首之三：

欲將消息問天孫，津漢茫茫了不聞。怪底神仙多束縛，人間尚有自由婚。⁽⁴³⁾

(41) 文字轉引自林瑞明，《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臺灣新文學運動理論時期之檢討（1920-1923）》（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6），頁11。

(42) 同上註，頁12。

(43) 李碩卿，〈七夕書感〉，《臺灣日日新報》，第4399號（大正元年8月28日）。

詩中描寫牛郎織女礙於銀河，消息兩隔，雖是神仙，束縛反多，倒不如凡人的「自由婚」來得快樂許多；此處，李氏援引新詞彙入詩，意旨清楚明確，人人皆曉。再者，其同期另一首〈七夕戲作〉，也有類似的表達，其云：「世人多羨神仙樂，不識神仙苦更多。……作到神仙不自由，休問姻緣月下老。何如化作並蒂蓮，生生世世藕牽絲。自開自合無拘束，修到蓮花無羨仙。」⁽⁴⁴⁾ 同樣使用「自由」一語。而更有趣的是，此詩當時獲刊於《臺灣日日新報》，詩後附有小評：「西人云戀愛者，神聖，不羨神仙宜也。然又須關雎樂而不淫，斯無失風人旨趣，不然並蒂蓮即楊白花矣。」品評者在賞鑑該詩時，竟然宕開原先詩中李碩卿透過自由婚而認可凡人較牛郎織女幸福的論點，天外飛來一筆地藉由西洋所謂「戀愛者，神聖」此一新思想，去強化證成凡人不必羨慕神仙的必然性，可見時人已經深受新文明觀念之濡染。

新名詞之外，新事物也成為文人筆下書寫的對象，如明治三十五年（1902），林幼春作〈聽留聲機器歌即贈沈生〉，詩云：

山堂夜悄燈光沈，萬籟閉窳秋天陰。忽驚雷雨破空至，哀絃急管喧繁音。
……乃知奇器奪造化，可以悅耳開吾心。吾聞泰西良匠鬼工似，火車電
線窮討探。傳神之具亦無匹，此器並駕誠何慚。機關轉動百巧集，能使
我輩聲情酣。嗟嗟沈生汝勿耽，區區細物何足談。……⁽⁴⁵⁾

詩中描寫座中賓客乍聽留聲機器歌時的吃驚與震撼，貼切傳達奇器巧聲惑人之深，可惜末尾期勉勸誡沈生不可耽溺其中，仍是舊有格調。又如明治三十九年（1906），日本在臺發行彩票，詩人旋即以此為題，黃砥臣〈彩票〉便云：「多多厚福逼人來，彩票籤筒及第魁。我輩應知為善寶，命須常養得天財。」⁽⁴⁶⁾ 詩意依然不脫積德者自然有財的傳統思維，但詩題卻富饒新色彩。再如，大正二年（1913），瀛社秋季吟會的擊鉢詩題〈無線電〉，與會者顏雲年有云：「無聲無影勢奔雷，消息萬端去又回。萬里好音何處認，天機奪得此中來。」⁽⁴⁷⁾ 詩中刻畫無線電傳播之快

(44) 李碩卿，〈七夕戲作〉，《臺灣日日新報》，第 4399 號（大正元年 8 月 28 日）。

(45) 林幼春，〈聽留聲機器歌即贈沈生〉，收於氏著，《南強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1992），頁 11。

(46) 黃砥臣，〈彩票〉，《臺灣日日新報》，第 2518 號（明治 39 年 9 月 19 日）。

(47) 顏雲年，〈無線電〉，《臺灣日日新報》，第 4797 號（大正 2 年 10 月 14 日）。

速，表現時人對於此一新事物的驚異；而相較瀛社，臺中樂社的詩會活動有著更多此種「新題詩」⁽⁴⁸⁾的寫作，從傅錫祺編撰之《樂社沿革志略》看來，自大正二年（1913）至大正十三年（1924）年，至少出現過〈眼鏡〉、〈噴水池〉、〈汽車〉、〈電燈〉、〈空氣枕〉、〈華盛頓〉、〈演說〉……等為樂社詩人創作發揮的新題材。他如徵詩之作也有新題，大正七年（1918）周維金便以〈國民性〉為題，展開全臺詩鐘徵詩活動，張息六以：「當時漢族稱仁義，此日歐風講富強。」⁽⁴⁹⁾符合時代義涵的佳作，獲得入選。

那麼，詩界何以會出現這些新題詩或富新思維的作品，西學東漸的刺激固然是主要動力，但晚清新題詩的影響，也不容小覷，前述《臺灣文藝叢誌》在刊載中國文學作品上，便特別分期登出晚清詩界革命的大將黃遵憲《入境廬詩草》、丘逢甲《嶺雲海日樓詩鈔》的詩稿，不無特加措意於此之故。

再者，隨著時代變化，詩歌的文字也愈顯通俗，究其原因，除了新名詞的引用外，為求作品能為更多群眾所認知，也是促使創作文字日益淺近的關鍵。大正十年（1921），《臺灣日日新報》刊登黃錫祉〈訓蒙集格言〉，作品前面附有報社編者的相關文字說明，他提到：「近來思想界之民眾化，漸影響於文學界一般，其體制務取通俗淺近而易曉者，如支那之白話文，是其一例。是篇來自新竹，中有可採者，茲為介紹如左。」透過此段文字，吾人可以得知當時思想界的革新，促使創作者明白致力文學大眾化的重要性，為求啓蒙百姓，文字開始趨於平易；同時期，中國「白話文」的成果也為臺人所獲悉，並成為可以提供取徑效法的對象。但，如何使傳統文學承擔啓蒙大眾的任務？又如何能吸納參酌中國「白話文」的書寫方式呢？黃錫祉〈訓蒙集格言〉或許正是此一構想的實驗品，其作如下：

訓蒙集格言，先勸及童子。始基雖至微，成器常在此。勸告大方家，莫鄙無文字。移淺漸入深，勿譏為俗語。……幼兒初學食，最宜學好款。飯粒勿亂丟，食完勿鎮碗。食飯食無完，常常留碗底。作客別人家，此款真羞恥。……見人食物時，走開急急避。目若金相，將成流涎意。

(48) 「新題詩」的說法源自日本，指的是以來自西方的新事物為歌詠對象的詩作，晚清中國也有為數不少的此類作品，參見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151。

(49) 周維金，〈國民性〉，《臺灣日日新報》，第6626號（大正7年11月30日）。

此款野形容，真真不成器。……食物宜細晡，方能知味素。……欲食細細吞，咽喉免燒著。爲人父與母，幼兒教好樣。……幼叫父母名，父母失教示。……稱呼有大小，自幼教呼慣。開口罵人母，口頭語真輸。對口罵恁娘，一句還一句。出言罵人母，嘴斗真無取。……粗嘴野斗人，此事惡鄉例。凡下大小便，說放尿放尿。教示語言粗，此話真不美。……兒童當初學，最重是認字。……毛髮宜常梳，身體宜常浴。臨床勿當風，感冒病不著。坐椅宜端正，亂搖禮不該。……戲耍惡作劇，出手便有損。變面打與爭，性命真不穩。……雜事既然多，如何可辦理。……事欲至周詳，設立日記簿。巨細往與來，日記自不誤。……勤可以補拙，儉可以養廉。能勤當能儉，成家此兩兼。人間有萬事，任集難完處。善惡認分明，善行惡當除。訓蒙集近百，格言當心得。幸勿鄙無文，讀解誠有益。成書計百章，出臺灣新竹。作者是何人，黃錫祉編錄。(50)

這篇五言的長篇詩作，專爲啓蒙兒童而寫，由少而長，生活諸事，大小一一敍及，文從字順，老嫗能解，內容具有強烈教化作用，尤其大量引用臺灣話文入詩，如「鎮碗」、「金相」、「味素」、「燒著」、「教呼慣」……等，甚能顯見臺灣傳統詩人在順應新時代潮流中進行文學改造的用心。

(二)

詩歌之外，散文的創作，也出現了新樣貌，新題目與新思維，甚至白話的文字，時或可見於散文作品中。

如新竹文人陳福全發表於大正五年（1916）十二月的〈改用陽曆論〉，其文論及：

世界各國年曆，大概分爲兩種，一以月繞地球十二周圍一年，是以太陰爲方針者，號曰陰曆；一以地球繞太陽一週者爲一年，是以太陽爲定準，稱爲陽曆。就此陰陽二例而論，大有奇妙之狀態，特別之理想。查考月

(50) 黃錫祉，〈訓蒙集格言〉，《臺灣日日新報》，第 7708 號（大正 10 年 11 月 16 日）；第 7717 號（大正 10 年 11 月 25 日）；第 7720 號（大正 10 年 11 月 28 日）。

亮繞地球，地球繞太陽，雖為兩種之日期，仍有畸零不盡之時刻。月亮繞地球，約得二十九日十二點鐘四十四分二秒零百分之八十也，若定每月之日數，不得不先置零用整。……所以陰曆三年加閏一個月，還有不完之時刻，五年在閏。……據此而論，陰曆閏月，陽曆閏日，而陰曆被月纏所拘，難與太陽相吻合，……各種不便，均由此間而生也。但陽曆所關於全年二十四節氣，正合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也，……就此而論，陽曆亦利便於耕種、商業編制預算，政治上、教育上，更有密切之關係，並得官民之融通，切盼臺灣紳商，各界人士，極力棄絕陰曆，一律改用陽曆，以沐文明之餘澤，而作維新之先達。(51)

文章從陰曆與陽曆兩面析論，分別說明兩種曆法之所由來及其時間計算方式，最後歸結出陽曆較便利於現代社會。通篇作品不同於舊時的論說體文字，不僅題目具有時代意義，內容也展現出作者的天文知識，甚至行文間多所使用白話，遠較一九二〇年代才興起的白話文運動更是早了數年。而值得再予強調的是，陳福全此等具有新樣貌的文章，非僅止於此，在一九二四年以前至少還有〈晝夜里差正日論〉、〈陽曆四季之區分法與溫度關係錄〉、〈原時〉等篇。

其次，與陳福全有同鄉之誼的周維金，也有近似的作品，如其於大正四年(1915)所刊載的〈精神修養論〉一文云：

且夫吾人生斯世，乃表現其超絕心靈，其間有思想構成力及機關編成力二款之大作用。夫思想構成之結果，謂之精神；至於機關編成之結果，即謂之身體。其身體及精神，全然不離，其結果之關係，自然之理也。然其精神狀態快闊之時，身體自然健康，故吾人之身心，乃是一體之結合，設其分界畫線，然不可使其區別，凡吾人或笑或泣之狀態，實乃身心相關，有不可思議之巧妙。就此關係而論之，雖與動物一般，然相關的生活之發揮，是人道也，故其身心，可以自覺而謀其健全也。……(52)

本文原文甚長，《臺灣日日新報》曾經分為多次刊載，大抵周氏主張身體涵蓋身心

(51) 參見陳福全，〈改用陽曆論〉，《臺灣日日新報》，第 5898 號（大正 5 年 12 月 2 日）。

(52) 周維金，〈精神修養論〉，《臺灣日日新報》，第 5258 號（大正 4 年 2 月 7 日）。

兩大部分，而屬於心理層面的精神修養尤其重要，不僅關係到個人身體健康，也攸關國民性之養成，所以進一步呼籲眾人努力提升精神修養。而在論及國民性的養成時，一九一八年周維金更撰有〈涵養國民性之論說〉揭於報端，文中特別言及：

……學成然後國民有獨具之特質，自能立於世界，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成爲一團體，於是國家藉人民以成體，而成強國也。人無團體，其國必亡，故欲以國家爲強者，必須有自尊之精神，然後可以並立於世界。不然，方他世界，乃是競爭之世界，弱肉強食，則將有他團焉自外而侵之、壓之、奪之，則失個人之自由也，終爲人之奴隸。甚矣！人性之弱也。故國家欲自強，必須養成一般之人物，可以成其一國民之資格也。(53)

文中剖析學習與否影響人之性格甚鉅，所以人人均需向學，而一旦學成，便有獨立精神特質，成其爲國民性格，此爲國家強盛之根本。

藉由上述兩篇文字，不難發現周維金意欲透過其作，傳播文明知識於大眾的用心；而其他寫於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間的〈經濟論〉、〈宗教略談〉、〈常識論〉諸文，意義亦不外乎此。可見此一時期的漢文創作，已隱然承擔起新、舊過渡時代中啓蒙大眾的重任。

事實上，不只是上列散文創作具有新精神，陳福全在新舊文學論戰中面對張我軍大力提倡白話文時，更以「……我臺人，宜用言文一致體，如各報紙之記事，簡而單、淺而明，豈不勝於白話文之魯魯蘇蘇煩人尋味也。」⁽⁵⁴⁾加以反駁；透過其人言論，可知在時人眼中，當時的報紙記事，也早已採用言文一致、簡單淺明的文字，迥異明鄭以來傳統文言文的書寫表達形構了。而陳氏於此，更強調此種文字的書寫，較之中國白話文尤其簡潔扼要，不難想見傳統文章界革新有成。

(53) 周維金，〈涵養國民性之論說〉，《臺灣日日新報》，第 6563 號（大正 7 年 9 月 28 日）。

(54) 參見陳福全，〈白話文適用於臺灣否〉，《臺灣日日新報》，第 9047 號（大正 14 年 7 月 17 日）。

(三)

日治時期，臺人創作小說的風氣蔚然興起，「臺灣文社」附屬機關刊物《臺灣文藝叢誌》便設有小說一欄，署名拋磚、陶仙、梅癡……等，曾先後撰稿發表。如雜誌第一號（1919）上，「拋磚」撰有節烈小說〈筑前正孃〉，作品描寫日本筑前博多赤間村之女子正孃堅守節烈不事二夫之故事，內容與一般舊式小說陳述傳統烈女事蹟情節相近，文字亦採文言為之，尚乏新意，但通篇出現日本地名及人名，並以此為創作背景，可見創作視野的力圖突破；又如雜誌第三年第七號，載君珊所撰小說〈破鏡重圓〉，以西人來弗魁馬汀夫婦為故事主角，描寫其婦與前夫破鏡重圓的故事，小說出現紐芳德蘭、非洲……等外國地名，西人日常食用麵包、果汁及在咖啡肆小飲的飲食習慣，並凸顯牧師在西人社會的重要地位，如此頗具西化色彩的書寫，在全篇傳統文言文語調的敘述模式中，更加顯露新舊雜陳過渡時代作品的特徵。

除了日本、西方的地理景物、人情故事，逐漸為臺人所注意而轉化為小說材料外，晚清與中國的種種事蹟，也是作者筆下發揮的題材，例如發行於大正十年（1921）八月的《臺灣文藝叢誌》第三年第八號，有「民哀」者採擇晚清軼聞而撰寫成〈虎賁中郎〉小說，內容敘述江南女子陸碧紅嫁給新科狀元曾源的傳奇故事；而第五年第三號上，署名「明道」者，則是參考當時中國軍閥粵軍、桂軍爭鋒於惠州的軼情，撰寫〈情彈〉一文，刻畫孝女許懿姑不幸喪命桂軍敵匪之手，文中藉由此一明慧女子的香消玉殞，強烈諷刺批判桂軍之不仁，書寫技巧雖然仍顯拙澀，但不乏藉小說以批判時局之意。

從以上《臺灣文藝叢誌》中經常出現小說創作欄看來，小說的寫作在當時應是日益獲得世人的重視，所以在日漸增多的小說創作中，也有以此而名家者，「臺灣日日新報社」的記者李逸濤便是佼佼者之一，作品極受讀者歡迎，可惜遺稿在生前就有散軼情形。⁽⁵⁵⁾此外，同屬《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之魏清德，向來雖以詩

(55) 參見「廣徵李氏遺稿」訊息，《臺灣日日新報》，第8506號（大正13年1月23日）。雖然如此，其實《臺灣日日新報》上仍然可以看到李氏頗多的小說作品，詳參黃美娥，〈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臺灣文學學報》5（2004年6月），頁1-48。

名，但其實也有多篇小說作品刊登於該報上，目前可見自大正五年（1916）至大正十一年（1922）間，至少發表了〈是誰之過歟〉、〈金龍祠〉、〈飛加當〉、〈傾國恨〉、〈還珠記〉、〈吾過矣〉、〈人面瘡〉、〈天一和尚〉、〈鏡中人影〉……等篇。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小說作品，若干頗具新意，已有新式小說的味道，且作品篇幅甚長，如〈是誰之過歟〉共計連載四十九回，時間自大正五年（1916）九月四日至大正五年（1916）十一月十五日止；〈金龍祠〉一文，則自大正六年（1917）五月五日開始連載，刊至大正六年（1917）七月二十九日，共有五十四回；〈傾國恨〉更自大正六年（1917）九月十九日載至大正七年（1918）三月十五日止，長達八十八回。

觀察魏氏在報上所發表⁽⁵⁶⁾的小說作品，率皆取材於日本或西方國家故事，如〈吾過矣〉記一巴黎百貨店女子愛雲艱辛尋父的驚險歷程，並且機靈用計卒使其父幡然改過的故事；〈飛加當〉則描寫一善於忍術的伊賀國人加藤段藏，以奇術投靠上杉謙信公及武田信玄公，卻因為人凶殘冷酷，終被擊殺身亡的故事，內容刻畫日本忍術之奧妙，令人炫目，不過作品末尾，魏氏自道「是事頗與唐書所載之崑崙奴，同一離奇詭異，崑崙奴以椎殺孟海之犬，飛加當以藥殺村雨之犬，更相彷彿，然崑崙奴俠也，飛加當詐也。觀其逞一時之小忿，幻殺八助，是其為人忍心殘刻，不待有狼眼狐顧之相，而始能誅殺其身云。」⁽⁵⁷⁾頗有藉此寄託教化人心的社會作用。

而在作品類型上，除了〈還珠記〉直接標示為偵探小說，〈傾國恨〉亦涉及偵探辦案之情節，作品的娛樂性極為突出，流露作品商品化、通俗化的色彩；〈金龍祠〉則以日本女子秀雲的一生為故事骨幹，敘述維新時代下人心機偽巧詐的面向，描寫世情之餘，也夾敘政治議題，展現新時代小說的興味；〈是誰之過歟〉係以探究罪犯涉案之動機、心理為主旨，且大量描摹偵探辦案之經過，亦可歸諸於偵探小說，而小說內多次介紹毛須藤因辦案所需而研發的新式科學儀器，頗有反映新學的作用。

此時期的小說，究竟展現出何種新樣貌呢？茲以魏氏發表於一九一六年的〈是

(56) 從目前各篇小說內容看來，究係翻譯或創作而得，筆者尚難斷定。

(57) 參見魏潤蒼，〈飛加當〉，《臺灣日日新報》，第6184號（大正6年9月14日）。

誰之過歟〉爲例，加以說明。首先，從〈是誰之過歟〉前所附緒言，可以得知本篇小說的創作殆受法治風潮影響而發，魏氏考察到十九世紀之半，歐洲已進化爲法治國家，治理社會的原則講究公正不阿，勿枉勿縱，因此連帶對於嫌疑罪犯的調查，也力避嚴重拷問的弊風，以求符合憲政自由，且進一步以探索犯罪者的動機、心理爲務；但同時，犯罪者的手法也日新月異，辦案者必須各方考究鑽研，才能瞭解犯罪者的種種行徑，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此篇小說的設計，魏氏以爲：

是篇者說，變幻離奇，一犯罪之檢舉，絞盡學小腦漿；一囚徒之搜捕，窮極老吏手腕，而其結果，恆常出人意外。嗟夫！使無學之徒粗心而忍性者，擔當其事，夫何有於水落石出之一日哉？是作即名以「黑箱記」亦可。然名之以「是誰之過歟」者，正所以昭犯罪動機不同。作者之微意，在乎其間者也。(58)

通篇正從兩面著墨，既寫辦案者抽絲剝繭，鬥智鬥力；復寫犯罪者機心巧詐，犯案手法多變，兩相較勁，情節起伏，波瀾萬重。而小說內容也朝此二方向發展，故事從英人蘆部公爵之女「遂願」頸飾失竊及因之喪命寫起，專攻犯罪學的學者毛須藤應邀前來調查，在運用催眠方法後，查得嫌疑犯葛爾八，但葛爾八在押解途中潛逃，後又牽連多樁命案，逼使警方陸續動用各式科學儀器協助偵測，最後發現一連串命案的幕後操縱者乃公爵之弟蘆部博士，在真相大白後，「蘆部博士以萬年筆之筆尖，刺破其胸，鮮血迸出，比與青色之洋墨接觸混合，變紅色而爲紫色。博士曰是即蠻爾頓船中所置之毒也。……」自殺身亡，奇案終告偵破。但，蘆部博士的犯罪動機爲何？小說以如下文字作結：

當今歐洲學說，盛倡半獸主義，曰精神文明，肉體野獸。論今茲歐戰，殺人如麻，精神上亦野獸也。蘆部博士，係理學界泰斗，一旦爲類人猿所齧，不免變成類人猿野性，餘可類推。昔達爾文論猿爲人類進化之祖，方今開化諸國，口文明而心時時發現類人猿之本性者，見於時事，見於侵略……，豈獨一蘆部博士乎？謂上帝仁乎？何故使善者易趨而爲惡，

(58) 魏清德，〈是誰之過歟〉，「緒言」，《臺灣日日新報》，第 5813 號（大正 5 年 9 月 4 日）。

惡者難改而為善。世界開明，戰爭之禍愈烈，若蘆部氏，本博士學識，而遂行類人猿手段，人將無可如之何也？嗚呼！是誰之過歟？

蘆部博士因為被具有野性的類人猿所咬，所以出現野獸般的行為，因此犯案累累。從上看來，本篇小說本在思考人性的根本，但也藉之譴責歐戰的暴力本質，更以半獸之人蘆部博士影射歐洲開化國家，在東洋與西洋較勁的年代，這篇小說作品顯然具有強烈諷刺意涵。

另外，值得再予說明的是，這篇小說，根據前引魏清德緒言末尾所述「作者之微意，在乎其間者」來看，原作者似非魏清德本人，殆一翻譯作品，但以上作品，不論就其思想主旨，內容架構，或情節安排，人物心理，表現方式，皆具新意，對於當時的讀者或創作者而言，應有開智啓慧的作用，得使臺人視野更形開闊。

以上，有關過渡時代的臺灣小說，至少有如下特點：其一，從《臺灣文藝叢誌》及《臺灣日日新報》上的若干作品看來，可以發現〈筑前正嬢〉、〈破鏡重圓〉、〈虎賁中郎〉、〈情彈〉、〈金龍祠〉、〈傾國恨〉、〈吾過矣〉……等多以女性為主要人物，內容藉由婦女不同際遇的書寫，探討各類社會問題，或陳女性貞節之可貴，或述維新社會中婦女貪慕虛榮而肇禍，或論女性婚姻之自主權，或述家庭中女性處境問題，足見作家對於婦女地位的重視。其次，在《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的作品，大抵屬於連載型的小說，且其中頗多可歸類於偵探小說，顯然承擔著娛樂大眾的功能，但在這些受到時人極大注意與興趣的通俗性作品，卻也同時具有啓蒙大眾的精神因素，確立了教育讀者的任務，而有著其不容忽視的進步觀點。

五、遲到的臺灣新文學

一八九五年後，若干臺灣傳統文人為求肆應新局，誠如前述，在思想與文學上，曾經出現革新的想法與改良活動，也因此傳統文學的河流中，其實醞釀著一道向「新」邁進的伏流，但何以臺灣新文學典律的萌芽要待一九二〇年後，而其得以確立地位進與舊文學相頡頏，更要至一九二四年新舊文學論戰爆發以後呢？且日治時期的臺灣，由於與日本、中國的特殊關係，因此中、日兩國文學改

良運動在傳播媒體或其他交流管道中，都極可能影響臺灣，但臺灣新文學為何姍姍來遲？難道臺灣人不知道中、日兩國歷年來文學界的改變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張我軍在〈糟糕的臺灣文學界〉中言及：

像臺灣那般小小的島，而且幼稚的文學界，不知自行革新也罷了。但這幾十年來，日本文學界猛戰的炮聲，和這七、八年來，中國文學界的呼吼，都不能打動這挾在其間的小島，欲說其是已麻木也太可憐了！
.....(59)

在張氏的想法，其個人也以爲臺灣夾於中、日兩國之間，理當受到兩國文學的刺激影響，進而改變臺灣文學的創作模式。而事實呢？

從日本與臺灣的關係看來，殖民教育體制中的若干教學活動或教科書的教材，或市上販售相關日本讀物，不乏提供臺人接觸帝國近代文學作品或新文學觀念的機會，而如此的背景其實有利營造新文學的生存空間。且在學校之外，報刊傳媒也曾登載當時日人的「言文一致」體作品，如明治三十二年（1899），「西南生」（安參永）於《臺灣日日新報》上發表在臺從事地理勘查的心得；明治三十三年（1900）則連續數月刊載館森鴻前往中國大陸旅遊的遊記作品〈模山範水〉；佐倉達山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發表的〈十五年前の夢〉亦採相近文體創作；《臺灣文藝叢誌》更在創刊首號就出現「則以氏」所譯述的〈夏木漱石傳〉，專文介紹日本近代文學這位重要大家，如此可知臺人多少已經知悉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近代文學階段。當然，由於語文轉換的關係，臺人要在日治之後，迅速學習日文並借鏡取效日本近代文學，從事文學創作，洵非易事，但至遲在一九二〇年代，臺灣已被統治三十餘年，何以日文新文學的作品仍寥寥無幾呢？

另外，在中國方面，晚清文學改良思潮，臺人當也不致陌生，尤其一九一一年，文學改革運動中最具影響力的活動家梁啟超來臺，自然更加利於傳播其人推動各種文學革命的事蹟。又，若干具有中國遊歷經驗者，也能掌握大陸文壇訊息，如一九一五年九月，時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也是臺北瀛社重要社員的魏清德，轉往福建《閩報》任職，次年發表〈旅閩雜感〉以誌所得，其中言及當時閩

(59) 參見張我軍，〈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北京：臺海出版社，2000），頁6。

省文學的情形：

閩省文學分新舊兩派，……大抵年少人士攻新學者，類多於固有國粹，文義鮮通，而罷官去職一班不得志之徒黨，顧影自穢，甚至以作詩為莫大之恥辱者，同一新聞紙上論據，與其尊堯而述舜，不如談美而稱歐，號稱進步優為讀者所稱誦焉。……廁聞國家民族之隆替，關於文運之盛衰。……支那交通不便，其語言未能統一，例如榕垣省會之用語，與閩省地方用語不同，文字雖不普及，舉國通用，文字者有形無聲之語言也，文字為世界的應時勢之要求，則國民思想亦世界的應時勢之要求，文字卑鄙頭巾則國民思想亦卑鄙頭巾，龍門百斛鼎，筆力可獨扛，惟大文豪為能積健為雄，興文字革命之師，作輿論之指歸者，又其誰乎？蓋改良支那目下之急務也。(60)

此篇文章發表在一九一七年中國白話文運動爆發之前，故魏氏所謂新、舊二派之分，其實應指晚清以來至民初的文壇狀況；如此，透過本文所述，顯然臺人對於胡適推動的白話文運動興起以前的中國文壇脈動，亦甚知曉。至於新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梗概，從一九二〇年七月起陳炯、黃朝琴、陳端明、黃呈聰……等人陸續發表鼓吹白話文的言論，臺人業已有所掌握；而在此之前，報端亦間有介紹文字，如「守舊」在大正九年（1920）四月四日所撰〈詞章界之惡化〉，便對當時中國文壇表現有所說明：

支那詞章界之論法，其妙處至不能增減一字。嗚乎！諒矣！輓近士趨末學，汲汲功利，於詞章一途，少有用心之者，故日流於卑鄙。近觀支那文化，其運動之新潮，厥有種種：一有以西國之文字直譯者，……。二有主張雜用羅馬字者，……。三有主張製造新字者，……。四主張用白話字者，……(61)

文中對於中國詞章界的新潮流十分熟悉，且清楚指出文字改革的四種方式。

(60) 參見潤庵生，〈旅閩雜感〉十三，《臺灣日日新報》，第5617號（大正5年2月16日）。

(61) 參見「守舊」撰，〈詞章界之惡化〉，《臺灣日日新報》，第7117號（大正9年4月4日）。

因此，綜上所言，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四年的臺灣，其實已曾聽聞或接觸日本、中國文學改良運動及付諸實踐創作的相關概況，然而何以臺灣新文學的起步會如此之晚呢？又，在本文前述舊文學界的一番文學改良活動後，何以不能迅速承接日本或中國的新文學觀念及創作成果而使新文學蔚然成風呢？

一九二三年，署名「超今」在〈田總督訪問記〉，曾經以辦理白話漢文報一事訪問田健治郎總督，結果獲得的答案如下：

若要普及民智啓發文化，實在很好，我現時也買上海廈門各地中國的新聞，看他們近來的論說都用白話，算是較前大大進步了。……要啓發民智，用這種方法很不錯。從前我曾對臺灣的漢學者說，你們何故不用像中國現在流行的白話呢？他們答說中國因為土地太大，各有各的鄉音，所以他們寫的我們也看不清楚，我們寫的他們也難懂。這話都也有理，我平時最喜看水滸傳，像這樣的白話我都可以明白，但是若加土音我就没法子了！……(62)

由此段訪問稿，可見日本官方並未阻擋臺灣使用中國白話文，阻力來源反倒出自臺灣傳統文人，而反對理由則是因為白話文係以中國鄉音為語言基礎，臺人聽不懂，既成書寫文字後也無法看懂。原來，臺灣新文學之所以遲到的因素，問題關鍵仍在傳統文人身上。

然而，回溯本文前述重點，傳統文人既能迎接時代新局進行文學改良活動及新題目、新思想的創作，為何這股追求新變的動力，仍然不足以鼓動舊文人勇於早早迎接新文學的到來或接納新的文學典律呢？除了白話文語言基礎的問題難獲普遍認同外，是否尚有其他緣故呢？

從日治初期的臺灣文壇看來，雖然當時日本早已步入近代文學的軌道，但來臺治理殖民事務的日官，反倒是頗多具有漢學背景，善寫漢詩者，在治理政策的考量下，日本並未貿然強勢引介帝國的近代文學來臺，而是刻意沿用漢文、漢詩以與臺人交流，如此倒使臺灣傳統漢文學的發展不致中輟，也間接排除了日文書寫系統早日形成的可能，連帶影響一九二四年爆發的臺灣新舊文學論戰將只是漢

(62) 參見超今，〈田總督訪問記〉，《臺灣民報》，第一號（大正12年4月15日）。

文新、舊文學間的抗衡對立，日文新文學則未捲入。而在臺人心中，漢詩不廢，則文化傳統得以延續，且又能與日本大和文化／文學產生區隔不被同化，對於臺人而言自是最為期待的美事。

一八九六年後，日本官員便時常藉著漢詩此一文學媒介，進行官紳薈萃、雅集交際，或徵詩交流、彼此唱酬，水野遵、土居香國、加藤重任、黑江蛟曾在龍山寺舉行的「觀月雅會」；一八九九年，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在「南菜園」邀宴詩人；一九〇五年，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官邸「蔦松閣」落成，對外徵詩，與臺人吟和；一九二一年時，田健治郎總督則與臺灣詩人茶敘賦詩，並結集出版……等。是以日人的種種表現，不僅化解割臺之際，傳統文人對於漢文學存滅處境的憂慮，其後，也因日人舉措而愈加肯定漢詩不敗的地位，鞏固舊文人在社會所享有的殊榮身份及舊文學在臺灣文壇的地位，這樣一來，無疑提供了舊文學一個持續穩定成長的空間結構。⁽⁶³⁾於是，在日人治下的社會，設法維持舊文學的地位於不墜，也就可能隱含了文學傳統的擁護、文化命脈的延續、國族認同的堅持、社會地位的確立等多重意義了。

如此一來，由於日本來臺官員或文人的選擇漢詩／漢文為文壇交流之主要媒介，臺灣在日治初期就已經再度確立了過往以傳統舊文學為主的文學社會型態，因此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四年間臺人曾經提議或實施的文學改良活動，其改革的主體仍然不脫離以舊文學為思考中心，亦即所有的改革雖然有為新文學暖身的催化作用，但當時改革者的一切思維大多是因舊文學而發生、發聲的。所以，臺灣在此過渡時代的文學改良運動，其在本質上，既是植根於舊文學之上，則其開花結果，也必然是從屬於舊文學本身，任何「形變」或「質變」也以不脫離舊文學的典律為依歸，是以儘管此期有關文學觀念或創作的改革變化，已漸漸趨向新文學，有利新文學的到來，但在現實世界中，諸多舊文人之視新文學典律仍是「異質」（一種接近西洋文學而非孕育自臺灣原生文學傳統的產物），甚至格格不入。因而，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四年間，舊文學嘗試改革這股新變的力量，雖使傳統文學釋放出一種向新文學過渡轉化的可能元素，但其內在本身也同時存有日後抗拒

(63) 以上所述，有關日人與臺人以漢詩溝通交流的情形及其背後的文化／文學意義，可參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 3 (1997年9月30日)，頁43-88。

排斥新文學的必然因子，而一旦新文學出現，兩造之間引發對立自是無可避免。

除了上述舊文人／舊文學本身內部潛藏著既「迎新」卻又「抗新」的矛盾性文學結構外，當時外在環境的社會氛圍，也使舊文人／舊文學倍感威脅。因為新時代下，新學興盛，導致以傳承漢文化為主的漢學不振；西風東漸，西洋文化駸駸日上，影響固有人倫道德，動搖傳統文化的根本所繫，諸多傳統文人對漢學前途憂心忡忡；但新興的「新文學」卻與新學、西洋文化有著密切相依的關係，致使舊文人在看待新文學時不免有所疑慮，直至引發衝突。關於此點，筆者已於本文第二節第三項「西洋文明 vs. 東洋文明」中提及，茲不贅述。⁽⁶⁴⁾

於是，觀察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二四年間的舊文學界，將會發現，在前述多重複雜的文化、社會背景因素下，臺灣傳統文人在過渡時代所進行的文學改良與革新活動，既有其承接轉化新文學的可能軌跡，但卻也同時存在著不得不捍衛舊文學本位的必然機制，在「迎新」與「守舊」兩股力量的拉扯、衝撞下，這種緊張關係，影響了臺灣新文學萌生、茁壯的時機，因此勢必要到一九二四年張我軍點燃新舊文學論戰，全力向舊文學展開砲轟與攻擊後，才能再度召喚或凝聚舊文學界中向新文學靠攏的潛在力量，以及獲致更多認同新文學的新生代聲音，進而匯集創造出「新文學」的生命洪流，奮力向前奔瀉而去，汨汨不絕，至此才宣告臺灣漢文新文學時代的真正來臨。而一旦新文學創作環境被形塑成功，繼漢文新文學之後，日治初期以來一直未獲熱烈耕耘的日文新文學，也將在一九三〇年代後受到更多矚目而逐漸大放異彩。

六、結語

本文的撰寫，旨於省思當前臺灣文學史中「新舊文學對立」的史觀，並在此一問題意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臺灣舊文學與新文學間的辯證關係。究竟文學的發展，其間有無傳統的生機滋養？還是必須通過與傳統的斷裂，才能獲致實現的可能呢？而倘若傳統文學可為新文學的養分，又何以會爆發新舊文學間的對立

(64) 此外，對此議題，筆者也曾有專文加以討論，詳參黃美娥，〈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與文化思維〉，《臺灣文學學報》4（2003年8月），頁37-72。

衝突，而非包容與交融呢？

在探索過程中，筆者首先挖掘歷來論及臺灣新文學的興起時，鮮少留心過的舊文人／舊文學在新時代來臨時嘗試改變的革新進程，並注意到在此進程裡，傳統文人不管是對小說、戲劇教化功能的重視，或是進行詩界改革，或提議散文文字通俗化，實際都指涉出舊文人對於傳統文學已然誕生一種「新眼光」，此刻的舊文人在看待傳統文學時，著實有了不同以往的新情感意向與新自覺姿態；這樣的表現內化在創作過程中，必然有利文學新樣貌的形構，則臺灣舊文學到新文學間，無寧有著銜承轉化的可能。然而，在現實環境中，由於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宰制，傳統文學又有其鞏固中心主流地位的的必要，因此一旦面對新文學的出現，文學生態環境丕變的憂慮，也使兩造間產生對峙的緊張關係，使得原本可能存有的「連續」發展關係，也為之「中斷」，而看似「維新」的文學進程卒至蒙上一層「守舊」的外衣。於是，這段過渡時代的文學歷史，顯得波瀾起伏，充滿對話張力，其所具有的文學義涵，更加耐人尋思。

再者，本文探討過渡時代中舊文學的改革進程時，曾經指出其關鍵動力乃源於時代新變，故此革新進程亦可視之為臺灣傳統文人追求「現代性」的圖像縮影。而從文中所述，我們嘗試勾勒臺灣舊文人與世界接觸時的心境與處境，發現多數舊文人對於西方物質文明充滿魅惑，且在西風東漸中，逐漸體會到新學／西學與舊學／漢學不容偏廢，但泊自感受到西洋精神文明滲透傳統文化核心，導致臺灣社會倫理關係崩壞、固有道德淪喪，以及文化價值取向出現危機時，若干舊文人選擇「重構傳統」，以批判西洋文化或賦予傳統新義的方式，為捍衛東洋文化而發聲，呈顯出傳統文人在迎接現代化社會時多變的思想內容。至於，在美學與文學領域中的「現代性」，將會給臺灣過渡時代中的文學創作或翻譯作品留下何等烙印，臺灣作品如何書寫「現代性」，對「現代性」的指涉概念如何呈顯？這一切是本文力有未逮處，而將於未來再作探析。

定稿日期：2004.6.1

引用書目

- 《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5月-1944年3月。臺灣分館館藏。
- 《臺灣文藝叢誌》，1919年1月-1923年7月。臺灣分館館藏。
- 《臺灣青年》，1920年7月-1922年2月。臺北：東方文化書局複印本。
- 《臺灣民報》，1923年4月-1930年3月。臺北：東方文化書局複印本。
- 《臺灣詩報》，1924年2月-1925年4月。臺北：臺灣詩報社。
- 文瀾
1960 〈從「揚文會」談到「新學研究會」〉，《臺北文物》8(4): 39-42。
- 林幼春
1992 《南強詩集》。臺北：龍文出版社。
- 林瑞明
1996 《臺灣文學的歷史考察·臺灣新文學運動理論時期之檢討（1920-1923）》。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吳德功
1992 《吳德功全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施懿琳
2000 〈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臺灣古典詩壇的影響〉，收於氏著，《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頁229-270。高雄：春暉出版社。
- 2001 〈臺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8日。
- 夏曉虹
2001 《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張我軍
2000 〈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收於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頁5-8。北京：臺海出版社。
- 連橫
1992 〈東西科學考證〉，收於氏著，《雅堂文集》，頁16-23。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1992 《臺灣詩薈》。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陳沂
1920 〈文學與職務〉，《臺灣青年》1(1): 41-63。
- 黃茂盛(編)
1927 《崇文社文集》。嘉義：蘭記圖書部。
- 黃美娥
1997 〈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臺灣風物》47(3): 43-88。
- 2003 〈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與文化思維〉，《臺灣文學學報》4: 37-72。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 2003 〈傳統與維新：《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啟蒙論述〉，發表於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心暨中文系主辦，「文學傳媒與文化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年11月8日-9日。
- 2004 〈二十世紀初期臺灣通俗小說的女性形象——以李逸濤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的作品為討論對象〉，《臺灣文學學報》5: 1-48。
- 楊雲萍
1993 《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頁579-601。臺北：臺灣風物。
- 葉渭渠、唐月梅
2000 《日本文學史——近代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

鄭喜夫(編撰)

1992 《連雅堂先生年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Tracing the Track in History: Continuance and Transition of Taiwanese Old and New Literature (1895-1924)

Mei-er Huang

ABSTRACT

Current discussions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often take the 1920s as the dawn of Taiwanese New Literature when scholars like Chen Xin (陳焮), Chen Duan-ming (陳端明), and Huang Chao-qin (黃朝琴) advocated the use of vernacular Chinese (白話文). Focus of the discussion has been on the debate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Literature. Such emphasis seems to imply that the rise of the Taiwanese New Literature is viewed as an enemy of the Old Literature. Does such 'enmity' exist between the two? Or is such "broken relationship" is the only perspective when 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literatures?

From a different viewpoi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re and urge for new learning and new literature among the Taiwanese under the spread of Western influence from 1895-1924, which fostered the rise of the New Literature. Furthermore,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o 'New', traditional scholars with great influence in the literary arena also issued statements advocating for literature reform. This gave support and impetus to the new changes, thus cat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Literature. Hence, rather than brok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Literature is a continued one.

While the ground seemed to be ready for literary reform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Literature, its growth was affected by the Japanese emphasis of Han Poetry (漢詩) as the social model of the Old Literatur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straint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Literature. As a result, the dawn and rise of the New Literature in Taiwan came much later its counterpart in Japan and China.

Keywords: Taiwan new literatur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ransition period, Modernity, Opposition position based on historical view